千年古驿井亭铺

陶 标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十季）大型征文

井亭，坐落于安丰塘北侧乡野之间。此地地势平旷，良田广袤，纵横交错的高标准水泥路渠遍布乡野，灌溉水系四通八达，农耕条件得天独厚。这片水土丰饶的沃野，不仅撑起安丰塘畔“淮南米粮仓”的美誉，更留存着寿州至六安千年官道尘封已久的烟火往事。

早在汉代，这里已是寿春通往安丰故城（今安丰塘镇）的必经要道，地方古籍将其记作“城南五十里铺”。这条古道历经千年沿用，至宋代全面拓修，正式定型为寿州南下六安的官方主干道。古时驿道遵循“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的建制，官府在此设立邮传中转铺舍，专供驿卒信使歇马休整；南北往来的商贩、挑夫、行旅车马，亦多在此打尖落脚。古籍有曰：铺司为官，铺兵为卒，备有铺舍、铺马。

整条寿六官道自寿州城南出发，沿线依次排布杨家桥铺、碓亭铺、三十铺（申家桥），向南十里便是四十里店，再往南十里方抵达五十里井亭铺，是整条驿道中段至关重要的交通节点。人流往来日益繁盛，沿路饭铺、客栈、杂货小摊渐次铺开，初具集镇规模。官道行人车马用水需求巨大，乡民就地掘井取水，一口井不足以供给往来行人，于是接连开凿九眼古井，一字沿官道并排而立，彻底解决沿路饮水难题。

九井自古流传一则奇闻：若从任意一井取水，其余八井井水便同步荡漾起层层波纹，当地百姓视其为连通灵气的灵泉。每逢大旱之年，周边塘堰干涸，唯有九井水源不竭，稳稳维系整条官道通行，造福南来北往路人。因九眼古井成为此地最鲜明标识，民间便长久称此地为“九井铺”。

络绎不绝的车马商旅，滋养起九井铺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地处寿州城南五十里的关键驿点，沿路客栈酒肆常年门庭若市。当地一户孔姓人家，世代经营街边饭庄，积攒薄财后心生善念，自愿出资在古井群旁修建一座八角木亭，专供酷暑赶路的行人纳凉避雨、歇脚休憩。在古时乡土观念里，修路、造桥、建亭皆是积德行善之举，能惠及四方路人，福泽后世子孙。

这座临井木亭落成后，成为官道上醒目的地标。途经行人歇息之时，多以“井边亭子”代称此地，久而久之，民间“井亭铺”的叫法广为流传。此后数百年间，“九井铺”与“井亭铺”两名并行使用，直至明清两代修纂地方志，官府统一定名“井亭铺”，载入典籍，流传至今。古井旁的八角凉亭，既是千里官道上一道温柔风景，也是“井亭铺”地名诞生的源头。亭舍落成后，更多行商旅人特意绕道在此留宿歇脚。北宋名臣王安石当年南下安丰，专程探访时任安丰县令的同窗好友张旨，途中便在井亭铺驻足停留，沿途风物尽收眼底。抵达安丰芍陂之后，他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咏叹芍陂民生的名篇《安丰张令修芍陂》：

桐乡振廪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传。

日想僝功追往事，心知为政似当年。

鲂鱼鲂鲂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

楚相祠堂仍好在，胜游思为子留篇。

整首诗作以从井亭铺至安丰故城一路所见铺陈底色，诗中“鲂鱼鲂鲂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一句，生动描摹出宋代寿六官道商旅往来、粮船络绎、市井繁荣的真实图景，为千年之前井亭铺的热闹盛景留下珍贵文字佐证。

时光推移至明代，井亭铺西侧原野，长眠着大明开国功臣宣宁侯曹良臣，为这座古驿铺添上厚重忠烈底色。《明史》与光绪版《寿州志》均有明确记载：“安国公曹良臣墓，在寿州城南五十里井亭铺”，当地人世代称此地为“石马地”。曹良臣本就是寿州安丰本土人，元末天下大乱，他召集乡勇守护故土，抵御乱兵侵扰，后率部归附朱元璋，随军南征北讨，屡立战功。洪武三年，受封宣宁侯；洪武五年随军北伐漠北，沙场浴血，壮烈殉国。明太祖朱元璋感念其忠勇，追封安国公，赐谥号“忠壮”。遵从落叶归根的遗愿，其灵柩沿寿六官道运回故土，择井亭铺官道之畔修建陵园安葬。当年侯墓陵园规制宏大，神道两侧整齐排布石人、石马、石虎、石羊等石刻造像，威严庄重。昔日途经此地的官吏、百姓，远远望见神道石刻，皆心生敬意，或下马驻足行礼，一代开国忠魂，静静守望家乡这条千年驿道。

千百年岁月匆匆流转，当年车马喧嚣的寿六东线官道早已废弃荒芜，沿街连片的客栈、饭庄、杂货铺尽数消散在岁月之中；古井旁标志性的八角木亭早已损毁无存，九眼古井大半掩埋于黄土田垄之下，仅存一口古井静藏乡间田野；曹良臣陵园历经战乱、农耕侵蚀，神道石刻散落田间，只剩零星残石诉说往日荣光。如今漫步井亭乡间田野，古驿官道路基早已融入阡陌田地，痕迹模糊难辨。抬眼远眺，安丰塘灌区沟渠纵横连片，无边无际的稻田铺展如碧绿海洋，一派安宁平和的田园风光，再也不见古时车马驰道、商贩往来的喧闹盛景。

从“九井铺”到“井亭铺”，一处地名的演变，藏着乡土风物变迁与市井人间烟火；宋代文人驻足题诗，明代忠侯长眠道旁，一座驿铺串联起两朝文史印记。在寿县诸多知名古迹之中，井亭铺算不上声名远扬，却依托城南五十里完整古官道脉络，牢牢留住独属于寿州南的乡土记忆，是安丰塘周边无可替代的文史地标。一眼古井，一座古亭，一条旧官道，一方侯陵，小小的井亭铺，收纳下整条寿南官道跨越千年的悠悠往事。

安丰塘稻田画 吴春燕 摄

考烈王的盛宴（二）：淮南嘉实

萧 阳

在武王墩墓东一室的积水中，发现了完整的栗子。考古学上有“千千年，湿万年”的说法，时间仿佛在这方寸间凝固了两千多年。显微镜下，栗子表面光滑，一侧平直、一侧圆鼓，小心翼翼拨动时仍有弹性，仿佛刚从树上落下来。

在植物遗存中，还可辨认出栗子、梅子、李子、枣等。这些保存在青铜鼎和漆木器中的果蔬遗存，当年是楚国宫廷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深受考烈王的青睐。

武王墩出土的水果主要有浆果和干果两类。由于腐败、炭化等原因，如今浆果只残留果核和籽，干果栗子的外形保存相对完好。

《吕氏春秋》中有“果之美者，江浦之橘，箕山之栗”的记载，可见栗子在先秦时期已被视为优质果品。此前，在其他楚墓中也出土过大量栗子，这种坚果在楚国贵族饮食中应当较为普遍。

甜瓜也是武王墩发现的重要水果遗存之一。《诗经》中“七月食瓜”的记载表明，瓜类在先秦时期已是常见夏季水果。甜瓜籽在武王墩和其他楚墓中大量出土，堪称高等级楚墓的“标配”，当时在楚国应有相当规模的种植，并深受楚人的喜爱。

先秦时期，桃、李、梅、杏、枣并称“五果”，《诗经》有“丘中有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吟哦，《周礼》中亦记载丘陵宜植“李梅之属”。楚人的李树种植技术已较为成熟，李子应该颇受考烈王青睐。

梅子有青梅、酸梅的别称。在食用醋发明之前，梅子是主要的酸味调味品。《礼记》中就有“兽用梅”，即贵族食肉要用梅子调味的记载。在楚国宫廷厨房，梅子可能不只是水果，更是烹饪调味品。武王墩的梅子多与猪骨等动物遗存出现在同一青铜容器中，用其酸味中和肉类的油腻。

先秦时期，枣树的栽培重心位于黄河中下游，但在楚地果园中种植也较为普遍，长沙、荆门等地楚墓中就多有枣核发现。武王墩的枣子，与兽骨、禽骨一起出现在炊器与容器之中，是作为肉食增加甜味的辅助食材，还是用于餐后鲜果、酿制果脯、煮制甜羹？这留给了后人想象的空间。

除了种类丰富的时令果蔬，还有传统中药材吴茱萸的身影。《神农本草经》载其“主温中下气”，性热味辛，可散寒止痛、降逆止呕。楚地气候卑湿、疾病易生，吴茱萸应是当时楚国宫廷常见的一味药材。

文献记载，楚国的瓜果还有柤（山楂）、樱桃、羊桃（猕猴桃），蔬菜还有芹、薇、薇、荠等多种类型。楚地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为各类果蔬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这些跨越千年的果蔬，诉说着一段被《楚辞》吟唱、被土地滋养的农耕往事。

古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的说法，橘柚是楚地最著名的水果。屈原在《九章·橘颂》中写道：“后皇嘉树，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史记》有“楚必致橘柚之园”的记载，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及淮河以南地区已普遍种植柑橘。

在已公布的武王墩出土文物清单中，并未出现柑橘的身影。然而，从自然地理条件与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仍可期待武王墩中出土柑橘的可能性。寿春地处温暖湿润的亚热带，理论上完全具备柑橘生长的条件，在其他楚墓中也有柑橘随葬的先例，湖北荆州夏家台楚墓中就曾发现柑橘残骸。

考烈王食物清单中丰富的果蔬，体现了楚国王室饮食的考究，以及战国时期淮南地区经济作物的丰产与优质。甜瓜的清香、梅子的酸爽、栗子的甘甜，这些淮南嘉实的味道穿越两千多年时光，仍在淮河两岸飘香。

小议《淮南子》“泰古二皇”之治

高 旭

古代圣王理想政治典范在《淮南子》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原道训》关于“道”的本体化论述之后。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们意图将“覆天载地”“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的形而上之“道”，通过理想化的“泰古二皇”（高诱、许慎均注“二皇”为“伏羲、神农也”）之治，从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具体展现出来，以此实现由“道”论“治”、执“道”为“治”的政治理念转换，为汉代统治阶层反思与探讨“道”的工具性、致用性、实效性问题，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的为政思路及方略。

《原道训》对“泰古二皇”之治的理想化描述，主要体现在“道体”和“道用”两个方面，而且始终将此二者紧密结合于一体来进行阐论。

《原道训》先云：“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继而便言：“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钧旋毂转，周而复匝。”刘安等人伊始即将“泰古二皇”之治视为“得道”的体现，而且是能够“得道之柄”，执“要”为治，故能“立于中央”“以抚四方”。刘安等人的论述，与《原道训》开篇关于“道”的本体化阐明相较，很显然更为面向帝王治国的实践，也隐含着对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现实的理论反映，期望中央“汉廷”与地方“诸侯王国”之间能够维系汉初以来因黄老政治而形成的宽松格局，继续呈现出“汉廷”“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的开明状态。也因此，刘安等人对“泰古二皇”的“得道”之治进一步给予了形象描述，认为其能带来“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的理想化效果，产生出神秘化的瑞兆效应。而且，刘安等人还期冀这种“得道”之治能够“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钧旋毂转，周而复匝”，恒久不变地存在发展下去。

《原道训》对“泰古二皇”之治的描述还不止于此，其又云：“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呴谕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觡生也，兽胎不贖，鸟卵不毈，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蜺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刘安等人明确将“泰古二皇”之治得以实现的理论根由，诠释为自然主义的“无为而治”，认为理想的治世发展是体现道家根本理念及精神的产物。在《原道训》对“泰古二皇”之治这种更为具象化的世界图景描述中，“得道之柄”促成的“神与化游”的政治状态，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性、伦理性蕴涵，“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由此，理想的治国状态同理想的治世状态有机融合起来，成为道家化天下大治的理想境界追求。在刘安等人看来，形而上的“得道之柄”最终是以形而下的“含德”之术来体现和反映的，这正符合其在《要略》里所提出的“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的撰著宗旨与论治理念。由论“得道”而倡“含德”，由论“执要”为政而倡“无为”之治，《原道训》对于“泰古二皇”之治的描述，以理想化、具象化的方式阐明了汉代道家自然主义的政治观、社会观、天下观，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先秦老庄道家或过于玄虚抽象、或过于游世不经的论“道”、论“治”路径，内在反映出西汉统治阶层面向大一统政治发展现实而迫切谋求长治久安之术的理论诉求和实践取向。

刘安等人在《要略》中言及“著书二十篇”根本上是为了“穷道德之意”，以达到“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的目的。因此，《原道训》作为《淮南子》一书的“道论”纲领，必然首先要对此有所体现，而围绕“泰古二皇”之治所展开的论述，正是全书为阐明道家自然主义的“无为而治”而作出的第一个具象化、理想化的事例证明。这也是刘安等人在《要略》中所主张“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的论治原则的具体表现。从中可见，《原道训》对“泰古二皇”之治的论述，实有其特殊复杂的理论意义，既承载着刘安等人对道家理想主义政治的期许与追求，也反映其力求将道家形而上之“道”推阐为形而下之“德”，进而具象化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理想化的为“治”图景，以此深刻影响西汉王朝统治者的理论动机。

从刘安等人对“泰古二皇”之治的论述里，亦可初步探察到《淮南子》所代表的汉代道家“道治”理念，同先秦老庄道家、黄老道家的异同之处。刘安等人对“道”何以为“治”的理论思考与阐明，比先秦老庄道家更多出了“执要”为治的黄老功利意蕴，同时较先秦黄老道家又更坚守了一些极端自然主义的理想价值，其亦“老庄”亦“黄老”、兼用先秦“老庄”“黄老”理念的汉代新道家色彩十分突出。显而易见，刘安等人从《原道训》开篇论述“道体”之后，即着眼于西汉王朝现实发展的为“治”需求，尝试与探索对先秦“老庄”“黄老”政治哲学及治国理念有所融合贯通、兼采用之，以“备”其独特的汉代大一统的“帝王之道”。如果说“泰古二皇”之治，因传说时代的“泰古二皇”而具有理想化，甚至空想化的“乌托邦”色彩，那么在此种看似距离现实较远的理论外壳之下，潜藏的却是最为实际的政治诉求，那就是刘安等人对汉初以来黄老政治的强烈思想认同和实践坚守。作为西汉前期最为重要的地方诸侯王之一，如何在日益强大的皇权迫近之下，求得务实可行的安国存身之道，实乃淮南王刘安最大的政治隐忧和理论关切。《原道训》开篇不久即对“泰古二皇”之治进行理想化描述与黄老化诠释，观此而论，就显得颇为耐人寻味了。

锔碗补锅，藏在老北头的市井记忆

高振中

田家庵 老北头 趣闻轶事

上世纪60年代，是把一日三餐作为家庭暖色的时代，锅碗瓢盆就是调和鼎鼐的乐器。由于物质拮据、生活困难，很多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是“一草尖顶一露水珠儿”，没有多余的备份。家中如果来客人了，从街坊邻居借个锅、碗，是常有的事，这些往往由家里的孩子担任“外交部长”，从小就磨练处理“对外关系”的功夫。

每到这时，奶奶一边在锅灶前手忙脚乱，一边既鼓励又信任地对我说：“你这孩子嘴甜，去隔壁奶奶家借几个碗。”来客人总归有好吃的，又有奶奶神情慈祥地说我嘴甜，物质诱惑、精神滋润双向助力，我挎着篮子屁颠屁颠地跑出去。于是邻居家就有了我稚嫩的童音：“奶奶好！我家来客人了，借你家几个碗，用好了马上就还。”

说到这里大家都有一些疑惑，锅碗是一个家庭的必需，还需要四处借吗？每个年代都有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如今盛世年华的人们难以体会。在那个时代，日子过得俭省，不光锅碗瓢盆要互相借着用，就算锅漏了、碗裂了，也没人舍得随手丢掉，总要找手艺人修修补补。锔瓷锔碗、敲铁补锅都是正儿八经的营生，也成了“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里实打实的一门手艺。

60多年前，田家庵老北头淮河路与港口二路交界处，新建的红光大戏院，人来人往，是淮南最热闹的地方。戏院对面就有一个锔瓷（锔碗）、补锅的摊位，那儿的手艺人也是市井烟火中最活跃的身影。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锔碗”。家中的瓷碗碰开裂了或摔成几瓣，就到锔碗的摊位上寻求“破镜重圆”。

手艺人此时闪亮登场。锔碗修复先要找碴对缝，像拼图一样，将破碎的瓷片按原状拼合并用线绳固定。然后根据裂纹的长短、走向、造型，确定锔钉的位置、数量和排列方式，力求既牢固又美观。接着用金刚钻在标记点打孔，孔深通常在器物壁厚的三分之二处，钻而不透，既保证抓力，又确保滴水不漏。这时候将事先用铜或铁制作、两端带钩的锔钉嵌入孔中，再用小锤敲实，让锔钉像“拉链”一样把裂缝紧紧咬合。然后勾缝抛光，用鸡蛋清或糯米汁调和瓷粉，填补锔钉周围的细小缝隙。最后用细布将碗打磨抛光，让钉面光滑不划手。

锔瓷用的“金刚钻”，可以说是最核心、也最传奇的工具。金刚钻的结构非常精巧，主要是将米粒大小的金刚石（钻石），镶嵌在一根长约手掌的铁棍或钢棍顶端，师傅用掌心按住以稳定方向并施加压力。用一根细绳或皮条像拉二胡的钻弓子，在钻杆上绕几圈，左右拉动带动钻头旋转。利用钻石的硬度，在坚硬的瓷器上钻出孔来。一个镶了钻石的钻头价格不菲，匠人大多自己制作或祖传，一把好钻能用一辈子，甚至传给后代。

老北头锔碗的这位手艺人能让我记忆深刻，是因为他更有特点。他是个“豁嘴”，说话有些不关风。他接过瓷碗，口中含含糊糊地与修碗的人比划着修碗的方案、价格。一双粗糙的大手拿着精巧的“金刚钻”，在瓷碗壁的“毫厘之间”打孔，然后细心将锔钉嵌入孔中，再用小锤耐心地敲实。手艺人神情专注、咬紧牙关，嘴巴随着每次敲锤一同哆嗦着，仿佛只有“同频共振”才能“完璧归赵”。修碗的人同样小心翼翼，同呼吸共命运地盯着，在挽救一个瓷碗重生的过程中，如同欣赏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从而收获从悬疑到解密的“多巴胺”满足感。

而有些人家中代代相传的瓷碗，更承载着中国人“惜物惜福”的情感。锔瓷不但是修复破损的器物，更延续了家族传家宝的珍贵传承。“豁嘴”就会更用心地设计出花钉、图案，使其兼具观赏性，仿佛是一种艺术再创作。

补锅也是常有的事儿。那时家中往往只有一口大铁锅，又炒菜、又做饭、又烧水，一专多能连轴转，铁锅往往“身心俱疲、未老先衰”。我在柴火灶旁拉着风箱，听见炉灶里有滋滋的响声，往往就是铁锅漏水的前兆。把生铁材质的铁锅对着阳光，有一点光线漏出来就是锅漏了的“铁证”。于是又到“豁嘴”的摊点去“救死扶伤”。补锅也是“豁嘴”的专长，这比锔碗要容易得多。用钢钎将“沙眼”扩大一些，把漏洞两边清理干净，将铁皮制作的补丁从漏洞两边敲打铆牢，铁锅就带着“勋章”回到战斗岗位。那时比起买一口新锅，补锅的性价比更划算。往往一口锅身带好几枚“勋章”，炒菜的人就要小心翼翼，锅铲要仔细地绕开“勋章”的“堡垒”，与“勋章”和谐相处、共铸辉煌。

补锅在1965年还成为一个热点，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在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中的唱段名闻遐迩。这部戏围绕刘大娘反对女儿兰英与补锅匠李小聪的婚事展开，李小聪借助补锅展示技艺，阐明“七十二行皆重要”的理念，最终获得刘大娘认可。可见补锅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的生活现象。

“豁嘴”是个厚道人，也懂得“和气生财”的道理。一些人常把锔瓷补锅和豁嘴联系在一起开玩笑。

“你什么样的破碗、漏锅的活都干好了，怎么自己的豁嘴补不起来？”老熟人边递烟边哈哈大笑。

“这是招牌，留着豁嘴，谁都能找到我。”“豁嘴”点着烟，从豁嘴里往外吐着烟雾，怡然自得地享受着这好意的调侃。

到了20世纪80年代，铝制的“钢精锅”在市场上畅销，由于锅底单薄，铝锅往往还是新的，锅底就漏水了。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大街小巷常传来南方人的吆喝声：“钢精锅换底了！换钢精锅底！”年轻人的“走商”比“豁嘴”的“坐商”更有优势。再往后，不锈钢锅、涂层锅比比皆是，与新时代相得益彰，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如今锔碗瓢盆琳琅满目，新产品都用不过来，锔碗也坚固耐用，哪还需要锔碗补锅这一行业，这门手艺也几乎失传。但是锔瓷跨越千年，承载着中国人“惜物惜福”的精神内核，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古老的技艺在修复有价值的瓷器中，还在继续绽放东方的智慧与技艺光彩。

人生最重要的是享受过程，锔碗补锅的老手艺，如同千年大树的年轮，乡愁般印记在人的思绪里。老北头的豁嘴和他的手艺，如锔钉一般在我的脑海里扎根，已成为回忆老北头风华的一段不朽印记。